

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历史回顾 学术论评 及其对应用开发性研究的展望

——为《图书馆学通讯》刊行十周年而作

彭修义

人生有限,而事业的道路无限向前伸展,没有尽头。《图书馆学通讯》自复刊以来,不觉经历了十个春秋。十年来,它牢记自己的历史责任,以改革为动力,集中全国同人的智慧,努力奋进,为推动我国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特别是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建设上作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作为一个老读者,本文想围绕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一些回顾,并根据对基础理论的理解,就图书馆的基本问题,提出探讨性意见和解决办法,以祝贺《通讯》刊行十周年。

1979—1988年,这是我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十年,也是图书馆界实现重大转折的十年。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为我国人民带来了科学的春天,图书馆事业随之出现勃勃生机。

十年浩劫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十七年的理论探索几乎全部作为封资修的“黑货”被彻底摧毁了,图书馆学到底是一门什么科学?理论的是非曲直何在?人们感到困惑。

恢复和重建图书馆学理论成为图书馆工作者的迫切愿望,《通讯》复刊后,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积极担起并开展了图书馆学,特别是基础理论探索和研究的重任。

1978年,我随林科院的恢复回到北京,得以继续从事专业工作,深感心情舒畅,很想干一番事业。但从哪里开始?还是整天同文献打交道,只知其表,不知其里,哪将回到早就产生了一种厌倦情绪之中。我开

始环视中外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发现历来同事图书馆职者——尽管那时不叫图书馆——一个个学识渊博,其中称得起大学问家的,代不乏人。为什么到了我们这一代,竟活得那么憋气?难道我们天生弱智?没有人才?我不相信。联想起我的大学生活,有对那火红年华的甘甜的回忆,也有为求知欲不得满足的叹息。朦胧中,我似乎觉得,不是我们培养人才的目标发生了错位,就是缺乏理论指导。要改变目前的现状,适应时代的需要,看来只有透过文献的表层直接深入到文献知识中去,向科学的深层进军。经过几年的思考,到1981年,我写出第一篇论文,试探着投寄《图书馆学通讯》编辑部,想不到很快竟被刊用了,发表在1981年第3期上,这就是那篇曾引起不少共鸣和争议的《关于开展“知识学”研究的建议》的文章,从此我被推入积极的学术探索的激流之中,开始了我生活中新的一页。

本来,我只是偶而试笔,也没有考虑要从这里去敲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大门。然而《通讯》编辑部却看得很远,想得很深,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这里是一片亟待开垦的绿洲。在编辑部的引发和倡导下,果然迎来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争芳斗妍的春天。对图书馆工作者来讲,我总觉得,知识的研究很重要,它同图书馆有着特殊的关系。社会上的各种文献集中到图书馆,而文献的核心和灵魂是它所包涵的知识。图书馆利用文献与知识为读者服务,图书馆学即应当研究图书馆、文献、知识与读者。我将知识、文献(即图书)、图

书馆和读者作为图书馆学研究的四大对象来看,并将知识作为继图书馆层次、文献层次之后的第三个研究层次,对文献知识的研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多年来,由于我的个性和所处环境,身在图书馆而实际上却处于与图书馆界隔绝的状态,我不知道别人对哪篇文章观点有何反映,经年累月地一个人在那里冥思苦索;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国图书馆界引进了一个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也不知道有个什么布鲁克斯的“知识基础”。1981年写的那篇文章,完全是凭我几十年的直观感受和个人求真知的强烈追求,以及建立在这一感受与追求上的感性认识;坦白地说,那篇文章既没有什么理论根据,也没有什么国际背景;当然无可否认,我受到当时社会文化氛围的一定影响。1984年有的专业刊物仓忙上阵的那场关于“知识基础论”与“世界3”的雄辩论战的来龙去脉,我不得其详。我总觉得我的思想与他们没有任何必然联系,也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只在沿着自己的路,继续苦耕着。1985年,我从《通讯》第4期〈关于讨论图书馆学研究方向的一封信〉的编者附言中得知,编辑部“为了避免与当时社会上出现的某些不正常的现象混为一谈”,不愿陷入当时并不具备搞清这个问题(实质上是哲学问题)的条件下参与其中,“不得不暂时停下”了关于知识研究的讨论。后来,这“一阵风”过去,《通讯》不失时机地因势利导、疏通,松动了图书馆界自由舒畅而和谐探索的学术环境,引导图书馆界继续开展包括关于知识研究问题的进一步讨论。通过不自觉地卷入图书馆学界这一时期这场起伏跌宕的风浪过后,回过头来我不禁有些后怕;幸而得到编辑部的理解而避开了那场欲来山雨,对《通讯》主编者的政治胆识、洞察力和驾驭力深为敬佩,并为图书馆界这一时期赢得良好的学术环境而深感庆幸。

研究知识,必然要进一步研究信息和情报,研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而衍生出情报交流说和文献信息说,等等。交流理论的提出,是从事新型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必然结果,它可以包括文献交流、信息交流、情报交流、知识交流、文化交流等等,在以上各种交流说的影响下,人们开始详细考察现代图书馆延伸的情报现象,认为研究并满足社会的情报需求是现代图书馆的本质职能之一,且是必须着力加强的方向。基于这一认识,人们开始对《图书馆学基础》这在当时有广泛影响的统编教材作了全面地、严肃地审视,抓住这个问题不啻抓住了图书馆学研究的方向问题。《通讯》这时以极其敏锐的洞察力,予见到发表哪些文章对发展科学的潜在价值,如:发表张晓林同志《应该转变图书馆学研究的方向》一文,“再给图书馆这个似乎平静的湖面激起了一阵波澜”,大大推动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普遍深入的开展,收到了积极的成效。

《通知》在它复刊的十年,一方面力求站在时代的高度和学科的前沿,通过发表文章发现人才;一方面对一些新的观点加以捕捉,引导图书馆学人在一些新的领域进行探索。早在1982年发表的那篇《论我国新时期的图书馆学研究》,即催人警觉,振聋发聩。自那以后,随着科学和教育体制改革的新形势,图书馆学界出现了以众多学说为特征的多学派纷呈的格局,而当人们正为学派的表面繁荣而洋洋洒洒时,又是《通讯》准确地把握了研究发展的动向,发表了徐人英那篇《再论图书馆学研究方向的历史性进展》。文章对历年讨论中的各种观点进行回顾,加以评论,归纳出从予期的“必须转变研究方向”的认同,及以什么方式实现这一“根本转变”的建设性思维,直指“图书馆学研究方向必须与现实结合”的事物本质的勾勒。十分难得的是,其间还包括了作者自身从审视、困惑、蓦地回首的顿悟和所抒发的锲而不舍求

索的收获和喜悦。由此可见《图书馆学通讯》在几个重要的理论时期所起到的率先发祥,组织引导,使糊涂的观点得以澄清,使散乱的概念得到整理,使创造性的火花得到迸发,使科学的真知由一个研究能力传递给另一个研究能力,以形成比单个研究者智力高得多的“集体大脑”,从而促进了本学科的真正发展和繁荣,这正是专业学术刊物的最高宗旨之一,是它的出发点和归宿。1979年以来《图书馆学通讯》对图书馆理论建设的所产生的推动作用、深远意义和重大影响确难以估量。十年风雨,十个春秋,《通讯》及其主编者以其睿智、洞察力和驾驭水平引导图书馆学研究的步步深入,它没有辜负图书馆学界的委托与期待,必然赢得国内外众多的作者和读者的信赖和尊重。

学术研究不能没有学术评论,不能没有武器的批评相伴随。《通讯》善于掌握这一武器,在其发表的众多的学术评论中,范并思同志的一系列评论文章代表了一种类型。他以建设图书馆学为己任,尊重他人的见地而又不失自身的执着,善于发现缺口,勇于从我做起,积极寻求结合点。他的评论视野开阔,立论严谨并有巨大的穿透力。他的研究具有一种气势,不论是什么人物,只要处于“我”的研究视野之中,为“我”所评论,便一视同仁。从事理论评论的同志应具有这种气势,这不是什么冒犯权威,而是尊重事实,尊重真理,追求真知。近年来,发展起一种应用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发展战略研究曾是其瞩目的核心。这种研究也是基础理论研究的必然发展,因为理论总是要联系实际,总是要为实践服务的。实践是理论的源泉。这是否即是遵循实践、理论再实践如是循环往复而至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开发理论的格局,我尚未及深入研究。但我认为,基础理论研究必然要回归到这一步,这不是对以前研究的否定,而是继以前研究而在此基础上的不断升华。它是历史的

必然。探索和认识总是无限反复地进行而逐步深入的,不可能一次完成。从基础理论,到应用理论,到开发理论,只能一层层展开,并且相互交叉渗透,无论肯定哪一个方面而否定其他的方面,终究是无益的;人们吃第二个馒头才饱,用不着否定吃第一个馒头无用,是它们在共同构建整体的理论大厦,装点着学科的春天。而且,真正称得起基础理论的研究,不会也不能离开现实的土壤,它通过理论抽象所揭示的,正是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所应一以贯之的核心与精髓,也是这二者实现为读者和社会服务所要具体延伸的基本内容和动力。

二

基础理论研究并没有走完自己的路,并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它还应当继续前进;在继续前进中有两个任务需要完成,一个是要以自我为核心的自身完善,一个是要试探性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对一门学科的本质可以有不同的认识,由此产生不同的学派。有人说我国的图书馆学基本理论以众多学说的争鸣为特征繁荣了一阵子,现在需要综合了。各说都可以作出自己的综合,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那就是以图书馆为主导进行综合,而不要将图书馆综合到别的方面去,围绕别的主体进行综合,将会离图书馆的本质越来越远,顶多它只能综合图书馆的部分质的规定性。

关于运用基本理论的认识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是一个急待研究的课程。

要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首先要考察我国图书馆的现状,从现状的分析中指出问题所在。建国近四十年来,我们的图书馆事业虽有很大的发展,但仍不能满足四化建设的需要。我们的图书馆数量还不足,分布还不平衡,我们的藏书总量不能满足社会对文献知识的需求,我们的服务水平还只能在文

献层次上强行应付,无力深入到知识的深层,无力进行知识深层的加工与提供,当然谈不上物化性的创造;我们队伍的素质总体来说还不够好,我们基本上还处于手工作业的状态;而由于技术经济状况的制约,短时间尚无力进行较大的技术更新装备。以上说明,生产力水平低,发展不平衡,不能满足社会对文献知识的基本需求,是目前图书馆事业中存在的基本问题,我们的基本矛盾仍然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不增长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社会现有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的矛盾。这个基本矛盾与基本问题是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制约着我们的整个思想与行为。

目前,图书馆事业面临的困难是办馆经费严重不足。我们的图书馆事业主要是靠国家财政拨款兴办。目前世界性的书价上涨势必影响各种文献采购的品种与数量逐年下降,特别是外文书刊提价的趋势图书馆几乎难以承受,而不能足够的引进国外的新知识、新技术或减少外文书刊、文献资料的补充对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更为不利,这一点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经过科学分析,指出我们现在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商品经济,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领域,还应按价值规律办事。党中央的这一英明决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是图书馆界转轨很慢,图书馆事业历来被视为社会文化事业,全靠国家财政拨款并无偿地为社会服务,人们历来都是无偿地使用图书馆的馆藏文献。近几年来,有的图书馆试行有偿借阅招来一片责难。有偿借阅,固然不应是图书馆的方向,但单靠国家拨款,在目前国家财政还比较紧张的情况下,恐难于满足人们对图书馆日益增涨的需求,这是当前图书馆工作面临的十分严峻,值得探讨和亟需解决的基本问题。我认为,图书馆目前应积极引入开发的观念。这种开发,不仅为了满足读者现有的,同时也应

当开创读者对馆藏文献知识的新的需求的可能条件。参与把馆藏物化为生产力或商品环节中,如,当电视机尚未开发并引入家庭生活的时候,是不会产生广大人民群众对电视机的需求的。而读者新的需求的产生多半取决于图书馆知识开发的程度。

社会生产要借助于物质性的生产资料,也要借助于意识性的生产资料,两者相互对应统一于科学研究与经济发展的一般事实之中。馆藏文献知识是一种意识性的生产资料。这种意识性的生产资料,既可以用于物质生产活动,也可以用于精神生产活动,既可以创造物质财富,也可以创造精神财富,即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知识。

馆藏文献知识这种意识性的生产资料具有价值,可人们常常看不到这一点。物质性的生产资料人人承认,使用这种生产资料都自觉地付出一定的代价,而对于馆藏文献知识这种意识性的生产资料,人们没有要付出代价的观念,世界各国都如此。

图书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科学事业存在,为全体人民所有,这是社会文明的进步,但须明确的是我们的馆藏读者可以利用,图书馆也可以利用,读者可以直接开发,图书馆也可以直接开发。图书馆在自己开发的产品中凝结着自己的劳动,创造着新的价值,人们利用这种含有新价值的产品,理应付出一定的代值。我们通过主动开发,将自己的产品拿去与社会交换的。在交换领域,生产者与消费者相互间地位平等,一买一卖,两相情愿,似乎勿用扯起“有偿服务”这块遮羞布。

馆藏文献根据社会需要经过再创造的新价值而提供相应的文献服务和各种咨询,不仅没有改变图书馆事业社会文化科学事业的根本性质,而且扩大服务范围,开辟出一种走向企业型发展路向的不无先例。

图书馆的馆藏开发目前已经开始并且逐步扩展,但只是小规模地萌发或试行,随着经济建设的日益发展,势必会不断扩大。我

认为馆藏开发应是多种层次的,主要包括文献层次、信息层次、知识层次、技术与产品层次以及社会决策层次。我们要以多层次开发同时并举。其中,文献层次开发属资源型的,信息层次开发属情报型的,知识层次开发属理论型的,技术与产品开发属经济型的,社会决策层次开发属软科学应用型的,还可以有一些其他的开发。各馆可根据自己的性质,根据自己的条件,需要与可能,进行力所能及的开发。搞技术与经济的开发,道路比较宽广,特别是有技术与产品开发这一条通道,可同各专业所形成强有力的竞争态势;而服务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图书馆,则可以瞄向社会决策,当然文献、信息与知识的开发也大有可为,不宜忽略。

技术与产品层次的开发是一种新的开发类型,它是由图书馆直接将馆藏文献知识为生产技术服务,从而转化为物质产品。它要求图书馆到生产第一线去服务,带着文献、技术与管理知识,将一个工厂扶植起来,将一种产品开发出来,以强有力的竞争态势打入市场。它要求图书馆通过一定的社会调查与文献调查以确定开发的技术与产品方向。这是一主动长入社会经济,主动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行为。近来北京图书馆与有关企贸单位共同试办的旨在促进各高等院校、科研和企贸单位沟通信息,使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的“北京信息咨询交流活动日”,及近年来许多地方图书馆为“星火计划”服务的经验表明这种行为已卓见成效,日趋繁荣。多层次的开发,发挥馆藏文献知识的潜在作用。首先靠人和人才条件。图书馆应有多专业的人才,特别需要它所为之服务的那个专业的人才。事实表明只要图书馆的开发项目对路,有成效,吸引各种专业技术人才并不难。而只要图书馆的开发与社会生产有机地挂起钩来,馆藏资源将转化为物质财富,进而或可作为对国家财政拨款不足的一种补充来源。

如前所述,开发性服务关键在人,而人才

的培养与引进要建立在人才培养的基础上,为此,要认真改革教育方针,大力提倡在知识领域进行深层开拓的教育训练,以提高学生驾驭知识的基本能力,这项工作开始的越早越好。

三

无论从开发的角度考虑,还是从读者服务的角度考虑,都要解决一个宏观的文献供应体系和微观的馆藏建设模式问题。我们的宏观文献供应体系建设,从1956年的全国图书馆协调方案算起,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从提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文献保障体系与情报检索体系算起,也有十余年,但见效不大。而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与世界发达国家图书馆发展的趋势看,建立馆际协作以开展全国性的事势在必行。真正做起来也有些问题待进一步研究。

在全国范围内搞馆藏分工是对的,但如何分工,分工到什么程度,却大有讲究。多年来,我们搞的实际上是一种机械的馆际分工,它要求于各馆的是纯粹的专业馆藏。在机械的馆际分工与纯粹的专业馆藏的基础上,能否建立起一个可靠的文献保障体系呢?现在看来是很难的。有人根据系统的整体功能大于它的各部分功能之和的原理,认为各馆的馆藏虽然在文献整体上是不齐全的,但在它所分工的那个局部都是齐全的,全国联合起来,就能组成一个功能齐全的文献情报供应体系。这未免有点想当然。图书馆是为读者服务的,首先要为本单位的读者服务。每一个单位都是一个小社会,它对文献知识的需求是整个社会文献知识需求的一个缩影,单位间的文献需求是大量重复的,而且是巨大的重复。一种纯粹的专业馆藏,首先不能满足本单位读者对文献知识的多学科需求,因而不能满足专业研究与学科发展的需求,由这样的专业馆藏所组成的文献供应体系,必然将各图书馆驱赶到面对全国对本专业文献知识需求的被动境地,这样巨大

的社会压力,无论哪一个专业馆都承载不起。在纯粹的专业馆藏基础上组成的文献供应体系是单薄的,各供应点间的联系是单通道单连通的,而不是多通道多连通的;整个体系是一种单点供应,而不是多点支撑;是单层次提供,而不是多层次保障。每一个子系统即使对本系统的需求来说,结构都不完整,功能都不齐全,如何能组成一个全国性的文献保障体系?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人们对文献知识的需求是随机性的,人们从文献阅读中所获得的启发和引发的创造性思维也是随机性的,它要求我们的文献保障体系提供大量的随机通道,这个随机通道只有由各图书馆共同提供,而单一的专业馆藏原则阻碍各馆提供随机通道的机会而将文献阅读与思维创造的随机通道堵塞,这样的文献供应体系显然存在许多弊病。

宏观建构必须要有一个牢固的基础和条件,这就是要加强各馆的微观建设,并且要将其作为工作的重点来把握。在进行宏观建构时,我们要抓住各地区、各系统、各专业的中心图书馆,由它们构成一个基本的文献保障体系与情报检索体系,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全国大多数的中小图书馆,则要充分放活,由它们进行自主的建设与开发。

各馆馆藏建设应采取什么模式?应采用什么原则与方法来建立?从哲学的与科学的角度来说,有两种馆藏建设模式可供选择,从而也有两种相应的原则与方法。第一种是“以整体求整体”的原则、方法与模式,第二种是“以部分求整体”的原则、方法与模式。迄今的图书馆馆藏建设基本上属于第一种类型,它有许多弊病,因受许多因素的制约实际上无法贯彻。首先我们没有强大的经济力量以保证我们什么文献都予搜集;其次我们也不可能将所有的文献搜集完整;第三,无论什么人都无力阅读和利用全部的文献。“以整体求整体”的原则、方法与模式不符合图书馆的具体情况,也不符合事物发

展的客观规律。任何事物只能从“部分”中求“整体”,只能通过“部分”的建构达到“整体”的复归,从“部分”中创造出一个“整体”来。因而,我们宜采用推行“以部分求整体”的馆藏建设原则、方法与模式,大力发展这种类型的图书馆。

每一种事物都同周围世界有着复杂的联系,都是从周围环境中摄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来建构自己这个整体的,因而“以部分求整体”的思想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每一个图书馆都有自己的专业性质与学科性质,每一专业与学科都与众多的专业与学科存在有机的联系,专业与学科的发展,需要从众多专业、众多学科中吸取营养。因而,每一个图书馆都应以本专业为主体为核心,建立一个既有专业特点,又包括了众多学科的(主要是相关学科的)专业化的系统馆藏,这种“以部分求整体”的系统馆藏,是根据开发的原则和以知识为核心为动力的思想建立起来的,它以国际发展趋势作为自己考虑问题的参照系,它充分考虑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方向和竞争机制,按价值规律办事等因素。

今天只有采取开发的方针,才能为图书馆的“以部分求整体”的系统馆藏提供强大的经济保证,而只有开发开发信息知识的研究,才能为这种系统馆藏的建立提供强有力的科学保证。如果我们不能从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高度去把握整个的科学知识体系,不懂得各学科间及其与整个知识体系间的关系和联系,怎么能建立起这样一种系统馆藏。每一个图书馆,特别是各专业馆都要围绕自己所服务的专业与学科进行研究,去发现并疏通其与他学科及他科学体系的通道,去架设起这样的桥梁。图书馆学再也不能停留在知识的寻层,不能在各学科之外游弋,它要深入到各学科之中,通过对各学科的以及整体知识体系的研究来丰富自己的内涵,来发展自己的体系,来提高自己的理论深度,走出一条全新的路,开拓出一片全新的领域。

教图公司今年在教育系统各校的大力支持下,已全面开展了书刊的进出口业务和征订工作。

为了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成本,教图公司已建立了自己独立的发行系统,在全国大中城市已设立了41个转运站。教图公司的成立,得到国外出版商,书刊商的关注,现已与世界各国100多家著名的出版商和出版社建立了贸易关系和业务往来。从教图公司一年多工作来看,已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

因为公司刚刚成立,面临的困难还很多,同业之间的竞争也很十分激烈。我们相信,在中央各部委的大力支持下,在各校的热诚帮助和监督下,教图公司一定会克服困难,在竞争中茁壮成长。

我们祝贺教图公司的成立,并预祝它以十三大改革、开放精神为指导,努力建设成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全心全意为教育系统服务的图书进出口企业。

(杨振清)

编 后

本刊本期报道了王蒙等文化部领导视察北京图书馆工作和讲话摘要。讲话针对北图工作提出要“严格要求,强化管理”的精神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同期重点安排两方面的内容:改革十年与图书馆和学业透视。

前者主要有五篇文章分别从不同侧面、殊途同归地反映并论证了我国十年改革的浪潮给图书馆带来的最重大的突破是物化观念和参与意识的长入。

《让图书情报转化为最活跃的生产力》是副省长韩南鹏在湖北省科委、省文化厅、省教委等13单位成立“图书情报工作协调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他提出要解放生产力、提高生产力,开发图书情报资源。他明确指出这个委员会的成立将为湖北省图书情报整体化建设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

《现代管理者最关心哪些信息?》为沈阳市图书馆收集到的市委领导一班人对图书信息如何有效地参与为市政决策服务提出了具体要求,有一定透明度。

《一个新型的进出口机构》介绍了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公司。该公司是为适应我国

教育体制改革的需要而成立的教育系统书刊进出口的主要渠道,是国家教委直属的外贸企业。

《物化:科技情报的一个现代化特征》论证了一个尚未被我国图书情报界重视而确实存在于图书情报中的亟待开发的一种可转化为生产力和意识形态型商品的潜在力。

《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历史回顾及其对应用、开发性研究的展望》第二、三部分,从知识开发的层次上提出文献、信息、知识、技术产品和社会决策等五个层次的构想,颇值得研究。该文第一部分,从他作为作者和读者的亲身经历和受益中,充分理解并肯定了《图书馆学通讯》(1979—1988)十年来为图书馆学界出成果、出人才所作的多方面的积极有益的贡献。

学业透视则从业务视角发表了几篇本刊与作者、读者并肩笔耕并一以贯之以追求与顿悟的“理论联系实际”之作。

它们表明实践需要理论指导;而称得上理论研究的作品是离不开实际的。理论是进步革新的源泉,制定政策的良伴。

nature and religion. This article giv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Pei-Tang collection, as well as its formation, contents and specific features. The author praises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this collection. (page 47)

*On the Retrospect of Research into Basic Theories of Library
Science and the Prospect of Research into Utilization and Exploitation*

On the basis of knowledge exploitation, some five phases are here mentioned, namely, documentation, information, knowledge, technical products and society decision-making which are worthy of study. In the first part of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based on his experience and benefits as both writer and reader, gave quite affirmative assessment of the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in its ten years (1979—1988) contribution to the yielding of results and upbringing of qualified personnel. (page 70)

*A Report of the 1988 China Seminar of Tunhuang and
Tibetan Academic Attainments*

This Seminar was held Aug. 20-25, 1988 in Beijing. Over 200 delegates from 10 countries and areas attended the Seminar. Prof. Ji Xianlin was once again elected chairman of the Society, and he issued the call to give due importance to Tunhuang in China because the academic attainments of Tunhuang are being enthusiastically studied. During the Seminar, the Beijing Data Center of Tunhuang and Tibet which was situated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was formally open to the public, and the Library simultaneously gave an exhibition of Tunhuang and Tibetan materials.

During its 70 years of service,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never ceased the work of collecting and researching into Tunhuang materials. The newly established Beijing Data Center of Tunhuang and Tibet set as its task to collect, edit, process and to publish catalogues and monographs, and to offer reading and reference service to scholars home and abroad. (page 87)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announcement,

1. With regard to the ISSN of this BULLETIN, ISSN 1000-1042 has been printed in error for ISSN 1000-0402 in all its 1987-88 issues.
2. This BULLETIN adopted the ISSN beginning with its second issue of 1987, while simultaneously it related the beginning and ceasing date as well as the volume and issue number of its predecessor.